

“媒介专业主义”的悖论

李金铨

摘要

西方媒介专业主义的历史脉络，源自市场经济的勃兴，并蕴藏“进步运动”所发展出来的“恒久价值”，在理念上带有温和渐进民主改革的精神，在技术上则强调事实与意见分开。美英媒介目前面临专业主义低潮的调整过程。西方激进派对媒介专业主义的乌托邦式批评原具有进步的意义。但若不分青红皂白地跨文化移植，而在匮乏媒介专业主义的社会否定媒介专业主义，则无非是犯了“具体错置的谬误”。

关键词

媒介专业主义、进步运动、恒久价值、跨文化语境

作者简介

李金铨，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讲座教授。

The Paradox of Media Professionalism

Chin-Chuan Lee

Abstract

Media professionalism evolved historically as a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market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us emphasizing the separation of facts from values to maximize the audience. It also embodies the democratic reform impulse, traceable to the “enduring values” of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Media professionalism, at a low ebb, is undergoing difficult transition in the West. Radical critique of media professionalism may be of progressive implications in the West. However, it is nothing but a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 if such critique is exported uncritically to deprive media professionalism of its *raison d’être* in societies where media professionalism does not exist.

Keywords

Media professionalism,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Enduring values, Cross-cultural contexts

Author

Chin-Chuan Lee, Chair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近年来学界对于媒介专业主义（media professionalism）有许多讨论，我也顺着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脉络略陈管见（李金铨，2017）。首先，新闻媒介专业精神和规范之称为“主义”，在中文语境易滋误解，实因ism的翻译所致（其他涉及ism的中译——例如“东方主义”或“消费主义”——都有相同的顾虑），但“媒介专业理念”又不足以全面涵盖其意，故本文仍姑且沿用“媒介专业主义”一词，并视之为分析对象。媒介专业主义强调事实与意见分开，新闻呈现正反两面的事实，力求客观公正，这是1830年代以后美国市场不断抬头逐渐形成的规范。媒介为了追求市场利润，必须放弃党同伐异，避免事实混杂意见，逐渐形成多元报导的风格，让各种利益在市场上竞争制衡，以争取庞大的新兴中产阶级读者（Schudson, 1978）。学界论述和批评媒介专业主义的文章很多，立场分歧很大，但各方肯定媒介是社会“公器”——为大多数人谋求公共福祉——殆无疑义（可以参阅潘忠党，陆晔，2017）。在此，我只准备以笔记方式讨论涉及本文脉络的问题，即如何从不同的层次、脉络和语境，解读不同的立场和阐释，权充这场讨论的注脚。

首先，激进西方左派学者，姑且以塔克曼（Tuchman, 1978）为代表，若非怀抱左翼自由主义的意理，就是充满不同样态的社会民主主义憧憬。塔克曼从现象学的角度分析新闻机构如何建构社会真实，她批判媒介专业主义形同一套“客观的策略性仪式”（strategic ritual of objectivity），意谓媒介运用客观性的技巧，建立社会共识的假相，其实新闻网围绕着合法的中心机构，新闻节奏跟官僚机构的运转同声共气。这样时空交织所布置的“新闻网”，使得媒介机构得以善用有限的资源，灵活调配人力物力，以捕捉难以捉摸的外在环境，进而编织以“事实”为基础的意义之网。正因为“新闻网”的运作，媒介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得依附于（不是听命于）权力结构，其长远的宏观效果则是支持既有秩序，甚至抹煞异见，阻挠变革。激进派学者多少有民粹情结，他们批评记者和媒介在专业主义的保护伞下变得傲慢专横，高高在上，不论语言和视野都脱离了草根。这样笔锋一转，其实又可以联系到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角逐“霸权”（hegemony）的理论，做出精彩有力的分析文章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的立场与此接近，只是立论没有这么细致。他们说的对不对？假若出发点是“体制变革”（change of the system），从根本上否定现有政经体制的合理性，这种批评是深刻而颇具洞见的。吊诡的是：民主国家的主流媒介是稳定社会秩序的一股力量，社会上似未普遍认同颠覆体制的必要，更不赞成凭着浪漫的蓝图大修大补。

倘若我们降低调门，把焦点移转到“体制内变革”（change within the

system），看法就截然不同了。我们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步运动孕育了美国新闻界独特的“扒粪运动”（muckraking），记者以事实为武器，揭露官商的黑暗面，照顾民间疾苦，进一步巩固媒介专业主义的成熟。当年胡适自美归国的时候，曾对“扒粪运动”推崇备至。质言之，媒介专业主义包含一套核心价值和一套操作技术：技术上力求事实与意见分离，形式上力求客观公正，不偏不倚；这套技术后面是核心理念，蕴含着美国主流社会的“恒久价值”，旨在促进政治（行政、立法、司法）、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温和渐进改革，最终则务使民主体制“利他”，资本主义必须“负责任”，提倡“好政府”和公平竞争，反对财富集中与劳工剥削，不走极端，保护个人自由（Gans, 1979）。除非能够假设媒介维护社会的恒久价值，否则“客观性”的技术是无法落实的。一百多年来，美国新闻界的“扒粪”传统不绝如缕，而且与时俱进，“水门案”之类的事件不过是承其余绪的现代版而已。自由多元派相信，只有上帝可以设计出一幅完美的蓝图，但人类生而不完美，他们所构建的人间社会当然不可能完美，任何以权威暴力推行“救世主”式的激进完美方案，必然不择手段以达到崇高的目的，那终将是通往奴役的道路。他们一向认为现有的西方民主体制和资本主义社会大致健全（不完美，也不可能完美），因此没有必要动摇根本，只须和风细雨的局部改革，按部就班，一点一滴小规模修修补补，使制度更加完善而已。然而民主不是成品，而是不断追求完善的过程，人和制度都有很强的惰性，所以必须随时戒慎恐惧，舆论监督也永不歇止。换言之，媒介专业主义并不追求乌托邦的绝对理想，而是以务实方案处理“不完美”的人类社会。

西方学者批判全球性的媒介与资本垄断，激进派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的正当性，自由派则批评这些巨无霸跨国公司背驰“负责任的资本主义”（responsible capitalism）的基本原则，立足点不同，却是一种良性的知识（甚至政治）激荡。黑白之间有中间色，多数人犯不着斗得你死我活。在媒介专业主义的问题上，激进派和自由派貌似截然对立，在我看来则是“悖论”，如何取态和裁断，视乎解读者的政治立场、语境、在什么抽象层次看问题而定。媒介专业主义具有美英自由主义的特色，在历史脉络中形成以后，向外不均匀地输出。第三世界国家谈起媒介专业主义，多半停在话语层面，徒具表面形式，能够付诸实践的不多。正如穷人怕营养不良，富人怕痴肥和厌食，只有对症下药。在匮乏专业精神的媒介环境里唾弃专业主义，凭空盲目跟随西方激进派追求绝对的乌托邦想象，就像晋惠帝问饥民“何不食肉糜”一样虚幻又荒谬，而且不啻以火攻火，乃至煽风点火，使得火焰愈燃愈

炽，以致不可收拾。看到有人罔顾脉络，寻章摘句，或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硬拉西方的一派敲打西方的另一派，完全无助于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有少数聪明的糊涂人，为了迎合某种旨意而反对媒介专业主义，既是左支右绌，却又隔靴搔痒，那是根本没有办法讨论的。

反之，过犹不及，如果美国和西方社会把媒介专业主义成为不假思索的信仰，而且经制度化成为习以为常的实践，媒介久而变得太自大傲慢，与底层草根脱节，那么听听理性批判，应该如空谷足音，发人深省，颇有“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的解放意义。但激进派长于从根本批评现状，却短于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自由派则在可行的方案范围力求改良。有趣的是学界容易高估意识形态批判的作用。（必须说明：西方的左派通常站在批判权力的位置，但在中国，老左不用说了，若干极端民族主义的新左却拾西左之牙慧转而拥抱国家权力。两者固然不可混为一谈，却不失为知识社会学的好课题。）激进批判话语固然颇能在西方校园内引起思考或共鸣，但它影响新闻界的实践却不甚彰显，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苑转向”逐渐与社会运动脱节以后所共同面临的格局与困境。

尽管表面上水火不容，激进派和自由派其实都必须尊重共同的底线：新闻不可以罔顾事实（尽管对“事实”的理解有精粗），不可以故意说谎造假，不可以公器私用，不可以违反民主的价值。我常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不是在媒介专业主义的基础上，才可以谈“超越”媒介专业主义？“超越”毕竟不是“摧毁”，好比我们必须借助语言沟通，语言本身有它的内在限制，是必要而不完美的沟通工具。我们需要靠非语言和整体语境辅助语言的不足，但没有人会蠢到将语言一股脑儿抛弃；抽掉语言的沟通，其他外缘因素都难以奏效。譬如建筑，唯有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高层的楼阁才能有所依托。

毋庸置疑，现在是西方媒介专业主义几十年来的最低潮，恐怕正滑落到底线的边缘。美国主流媒介的“客观”新闻不断腐蚀，市场垄断和利润挂帅日甚一日，阅听者大量流失，党同伐异的趋势上升，媒介愈来愈与日常的社会生活无关，以致戕害民主的前途。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后，公众对制度与对媒介的信任危机更是雪上加霜。根据盖勒普的调查，2016年全美只有32%的公众相信主流媒介，二十年内竟然像雪崩式从半数（1997年尚有53%）掉到三分之一。更甚者，两极分化日益加剧，两党犹如陌人甚至仇人，媒介几乎丢掉了共和党人，因为只有14%（1997年尚有41%）的共和党人愿意相信媒介。但右派擅于利用新媒体发布民粹式的煽动消息，其中以特朗普及其盟友（如后来与之闹翻的Steve Bannon）最突出。“恒久价

值”面临严重考验，倘若因噎废食而毁掉专业主义，媒介更将缺乏公信，更无凝聚社会的功能。我认为西方应该会重整旗鼓，即使媒介难以客观公正，但记者不能无此用心，更不能因此明目张胆偏袒谋私。好在开放社会有自我矫正的功能，在周期性调整之后，钟摆终可望回复到平衡状态，专业主义将有所更新。传统媒介目前都设法改变经营策略、技术手段和新闻运作，以图在新媒体的竞争环境中存活或发展。而谷歌、脸书、推特等公司再厉害，若丧失公信是无法生存的，所以必须增加透明度，并以实际行动防范假新闻和憎恨性言论的流传。目前我们对新媒体的内部运作所知不多，但将来应该会有适当立法措施，矫正结构性的弊端（见*Economist*，2017）。此时法国正准备立法禁止网上散布虚假消息，也是改革与应对的先声。

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国，也好不到那里。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卡茨（Katz，1977）应邀为英国广播公司（BBC）撰写一项政策建议书，他罗列一系列他认为值得研究的问题，以指引未来产学合作的方向。卡茨引的文献以“行政型研究”为基调，遭到英国左派批判学者的反对；左派学者一直嫌BBC不够“左”，他们指责卡茨过分维护既有秩序（包括BBC），不利于广播体制的全面“民主化”。紧接着到了整个1980年代，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以市场为名推动公共资产私有化，猛力攻击BBC立场“太左”，企图取消它所赖以财政支持的“执照费”，矢言将BBC分而拆之（最后未成），这时英国左派学者别无选择，必须捍卫BBC为公共领域的最后一道防线。1990年代以后，尽管政权几经更迭，市场挂帅的“新自由主义”秩序一直没有退潮。如今寒风刮得更凛冽，严肃的主流媒介在新媒体的围攻下生存困难，广告收入几近崩盘，新闻公信降到谷底，社交媒体的假消息满天飞。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以后，根据Edelman的调查，宣称信任主流媒介的公众，从2015年的34%降到2017的24%（两年内跌12%），即每四个英国人就有三个不信任媒介。媒介的信任危机反映了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信任危机，这在年轻人当中尤其明显。在这样恶劣的生态下，媒介将何以为继？覆巢之下无完卵，假如媒介走投无路，那么再激进浪漫的想象都将化为泡影，因此左派学者也引以为忧。这种微妙的转变说明左派学者审时度势，原来在抽象的象征层次上反对媒介专业主义，但眼前清楚看到语境、意义和底线不断在移动，他们不得不调整发言位置和因应对策，以免（如西谚说的）把小孩和洗澡水一起泼洒出去。

全球化使跨文化交流频繁，促进思想的引入、混生与适调。这是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橘逾淮为枳，所以无法生吞活剥，而必须考虑到语境对接的程度与面相。媒介专业主义是现代性的表现，西方必须走出困境，已如前述。现代性有不同的道

路，不必定于西方一尊，何况西方同中有异，不可以简单笼统归为一尊。媒介专业主义在进入第三世界的语境以后，哪些有普遍性，哪些有特殊性，社会基础何在，如何转化到另一个社会和文化的肌理？这些都是极为复杂的问题，但维护公共价值、利益与观点的基本精神不可变。反之，贸然把西方的乌托邦式批评闭着眼睛搬到第三世界复制，轻率否定媒介专业主义，必造成帽子和头颅尺寸不合的讽刺，这是可以断言的。而在许多现代性尚未完成的社会，如何看待西方流行的“后现代”理论，也值得第三世界学者公开讨论。罔顾现实的社会语境，野蛮硬生地横向移植任何理论，不但犯了“具体错置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也是我执和妄想的表现。

史学界可以证明西方（包括英美法）的民主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充满血腥，但逻辑上是否因此引出“我们不要民主制度”（不管如何定义）的结论呢？马克思原来以人道主义批评西方民主制度不够彻底，而不是全盘否定它。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对“民主”的说法已是耳熟能详了，我对“媒介专业主义”的看法庶几近之：

许多形式的政府都试过了，而在这个罪恶和苦恼的世界里，将来还会再试。没有人假装民主是完美或全智的。的确，可以说民主是最坏形式的政府，除了时时尝试过的其他各种形式以外。（1947年11月11日，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演讲）

最后，我再举三例说明跨国语境对接的微妙关系，有时候语境重叠又留下缺口，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其意义在跨文化研究殊堪玩味。其一，记得在1960-70年代激越反战和反建制的岁月里，西方著名左翼理论家包括如福柯（Paul-Michel Foucault）和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都自称深受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之所以可能，在我看来，是因为他们只需要在抽象层次抽取毛主义的象征资源（例如矛盾永不熄灭论，和“长征”的隐喻），插入当时西方抗议政治和思想的语境，却不必正视文革在中国大地具体发生什么，更不必面对大规模的社会破坏与人性摧残。记得威廉斯（Williams, 1977）在阐发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时，曾提出“选择性吸纳”（selective incorporation）的概念，借用在目前这个语境未必说不通。其二，很久以前，我听过美国汉学家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的演讲，记得他说他最敬佩的两位当代中国学人是胡适和钱穆。狄百瑞身处西方汉学的语境，与中国的学术生态保持适当距离，毋须理会圈内分明的壁垒，方可相对超然，从两个极为不同的人物和范式选取他想要的营养。其三，萨义德（Said, 1994）的宏大叙述一直以“启蒙”和“解放”为中心旨趣。他主张知识人一贯对权

势者讲真话，不要有双重标准，所以他一方面批判西方殖民主义，一方面抨击阿拉伯世界（包括他的原乡巴勒斯坦）的专制封建主义。我们在阅读他的著作时，不要顾此失彼，只选自己要听的那边。媒介专业主义是否也该考虑到跨文化语境的对接？

（责任编辑：束开荣）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李金铨（2017）。传播研究的时空脉络。《开放时代》，（5），209-223。
- 潘忠党、陆晔（2017）。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国际新闻界》，（10），91-124。
- Economist（2017），“Social Media and Politics,” November 4-10, pp. 19-22.
- Gans, Herbert I.（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Pantheon.
- Katz, Elihu（1977）, *Social Research on Broadcasting: Proposal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London: BBC.
- Said, Edward W.（1994）,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New York: Pantheon.
- Schudson, Michael（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 New York: Basic Books.
- Tuchman, Gaye（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 Williams, Raymond（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